

##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和 1964 年奥运会之间： 超越景气对策，实现可持续发展模式

小岛 明（世界贸易中心东京会长、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理事兼客座教授）

被视为针对安倍经济学和安倍晋三政权的信任投票的 2014 选举中，仅自民党就单独取得远超半数的议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有 3 个需要注意的地方。第 1 个是，“只有这条路”的安倍经经济学及围绕其中的经济政策议论不知不觉中向“景气政策”倾斜，推动动向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构筑可持续再生日本模式的观点减弱了。第 2 个是，确实一段时期的悲观主义减弱了，对未来的乐观论诞生了，但到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前，有过短之嫌。第 3 个是，民主主义本身的统治问题在内外议论中，其根本——“投票率”跌至史上最低的 52% 左右，变成了“二分之一民主”。



小岛明 世界贸易中心东京会长、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理事兼客座教授

### Short-termism 的蔓延<sup>1</sup>

Short-termism 表示眼前思考、短期思考的英语新词变得处处可见是从 2008 年金融大危机开始的，对“高速交易”等证券市场的理想状态、甚至是整个金融商务的眼前利益思考的批判就是在那种背景下产生的。不久议论变为围绕企业统治 (corporate governance) 整体、甚至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统治展开。2012 年我有幸参加了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报告 40 周年纪念总会，那时议论的主题是“如何克服短期思考、眼前思考，并将长期思考政治、经济、经营统治转变为长期思考”。

在日本 short-termism 也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开来了。也产生“新 55 年体制”看法的自民党优越地位政治状况是在本次选举中发生的，我愿意期待政府充分利用这个政治环境，并努力构建超越眼前思考的中长期可持续的新生日本发展模式。

“新 55 年体制”基础上举办的 1964 年东京奥运会可以说宣告了后进工业国家日本从发展中国家毕业，并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当时的日本讴歌高速经济增长。与少子老龄化完全绝缘，出生率为 2.05。生产年龄人口从同年的 4,710 万人开始增长，1968 年突破 5,000 万人，1979 年则为 5,596 万人。“人口红利”支撑着高速经济增长，除了奥运会次年的反作用萧条（实质经济增长率为 5.7%、历年），从 1974 年到 1970 年，实质经济增长率持续

<sup>1</sup> 译为“短期主义”。指试图在短期内获得收益的倾向

超过 10%。

但是, 1964 年奥运会当时, 被轻视的公害问题从 60 年代后半期开始严重化。还有, 从 19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初期, 日本完成了追赶欧美发达经济的第一阶段。说第一阶段是因为, 那个时间点以汽车生产台数、粗钢生产量与美国不相上下为象征, 完成了在产业技术和生产力方面的追赶, 但人均收入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 也由于此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和 1985 年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 收入方面也实现了追赶。

问题是实现追赶之后。日本的各种制度、惯例在追赶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但追赶完成之后, 也就是 1980 年代后半期以后, 却阻碍了更进一步的持续发展。也存在一种将此视为“成功的悖论”的倾向。

## 在 2020 年奥运会上向海内外宣告可持续再生日本模式

遗憾的是, 1980 年后半期的泡沫景气, 泡沫景气崩溃的 1990 年代以后的长期经济停滞, 阻碍了后追赶模式的构筑。泡沫景气崩溃之后政府采取了 10 次以上的经济政策, 但新的可持续经济模式的构筑持续延迟。冠以诸如“紧急”、“包括性”、“综合性”等引子的对策, 都是些眼前性对策、景气对策。

跨入 21 世纪已有 10 余年的今天, 现实中采用的政策以景气对策和股市对策为中心。大家应该都在期待安倍经济学超越眼前性的景气对策。尤其是对“第 3 支利箭”的“第 3 条”结构性改革抱有很大期待。若这条都不充分, 即使眼前性地拉动景气, 也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很多人期待并议论到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前, 景气和股市应该都会顺利吧。不过, 日本面临的新课题在于 2020 年以后。少子老龄化今后也毫无疑问将变得更加严重。总人口在减少, 同时老龄化以老年人口率上升的形式进一步加剧。

家计的储蓄率(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率)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分别高达 14~17%、18~23%, 支撑着高速增长。

而该家计储蓄率在 2012 年低至 1.3%, 目前基本可视为 0%。团块世代也将退休, 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剧, 进入取光储蓄的阶段, 因此, 家计水准的储蓄率将变成负数。人们的目光容易投向巨额的整个金融资产。不过, 也要看运行利润, 但如建议取光储蓄, 金融资产整体也将进入减少阶段。

企业也不要只看眼前利益, 而要致力于新技术、商品、服务的开发、新领域的开拓、附加值的创造, 挑战风险的企业家精神受到考验。仅靠成本削减的经营将无持续性。

并非仅存在少子老龄化进程加速的问题。全球化竞争环境对日本来说将更加严峻。世界正掀起“制度改革的大竞争”, 试图构建更具竞争力或提高生产力的制度。自由贸易协定(FTA)这种两国间、多国间的贸易协定、地区协定不断蔓延。日本的贸易, 即所谓的 FTA 覆盖率很低。若这样持续下去, 优秀企业的工厂、经营的海外转移将加速。在对内直接投资方面日本也落后于世界各国。对内直接投资余额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仅为世界平均值的十分之一。

世界银行于 2014 年末发表的《商务环境》中的日本信用等级(2015 年版) 比上一年降了两位, 在 189 个国家中排名第 29 位。

只要不迅速且大胆地射出“第3支利箭”，就不会诞生可持续的日本再生模式。需要持有跨越“至2020年前”的观点。

日本银行提出的物价上涨2%目标，绝不是最终目标。改变通货紧缩的心理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超越物价上涨率的收入持续确保增长，国民的生活提高才应是目标。为拉动生产率的上升倾向，各种措施必不可少。不是“至2020年前”，而需要注视“2020年后”的构思和政策、企业统治”。

“失去的××年”的构思已不需要了。未来的关键是着眼于中长期的构思和行动。

[为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特别撰稿。]

---

小岛 明

世界贸易中心东京会长、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理事兼客座教授

---